



世界主要国家 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Security Policy of
the Maj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程 工 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主要国家 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Security Policy of
the Maj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程 工 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研究/程工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097-6141-0

I. ①世… II. ①程… III. ①文化-国家安全-
研究-世界 IV. ①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6467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著 者 / 程 工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赵 薇

责任校对 / 韩海波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141-0

定 价 / 69.00 元

印 张 / 17.5

字 数 / 276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同时承蒙亚东教育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序 章	001
第一章 美国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015
第一节 美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	015
第二节 美国文化安全政策的内容与实践	029
第三节 美国文化安全政策的特点与影响	044
第二章 日本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055
第一节 日本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055
第二节 日本文化安全政策的内容与实践	072
第三节 日本文化安全政策的特点与影响	100
第三章 俄罗斯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111
第一节 俄罗斯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11
第二节 俄罗斯文化安全政策的内容与实践	131
第三节 俄罗斯文化安全政策的特点与影响	147
第四章 德国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159
第一节 德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59

第二节	德国文化安全政策的内容与实践·····	174
第三节	德国文化安全政策的特点与影响·····	193
第五章	法国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204
第一节	法国文化面临的挑战·····	204
第二节	法国文化安全政策的内容与实践·····	213
第三节	法国文化安全政策的特点与影响·····	226
第六章	海湾阿拉伯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233
第一节	海湾阿拉伯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33
第二节	海湾阿拉伯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的内容与实践·····	245
第三节	海湾阿拉伯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的特点和影响·····	251
终 章	·····	259
参考文献	·····	266
后 记	·····	273

序 章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1月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研究背景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维系，是国家和民族的基本构成要素，对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着根本性的支撑作用。从历史上看，无论对哪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的兴衰都根本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命运。所谓国运昌则文化盛，文化兴则国力强。近几十年来，特别是两极格局解体和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往空前密切，时空距离日益拉近，世界各种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频度上发生交流、碰撞，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开始面临全新的时代背景。

在世界各种文化的交往过程中，文化确能体现先进与落后之分，落后文化接受先进文化是历史的进步。但这一过程应在独立自主、平等交往、充分考虑历史传统并结合各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进行，应该充分尊重各国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共同进步和发展。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实现自身利益和战略图谋为目的，利用自身在政治、经

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和资源，通过商品贸易、影视传媒、报刊书籍、人员交往和国际互联网等多种途径，或公开或隐蔽地对外传播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试图以文化的方式影响别国的发展。这种带有特殊目的的文化扩张行为破坏了世界正常的文化交往和进步，也对弱势国家的文化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损害。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和安全问题，文化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文化弱势国家的关注。

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下降，经济、能源、环境和文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综合安全观开始被普遍接受，世界各国开始更多地以综合、协作的视角来看待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文化安全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和内涵。

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世界大国，在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面临的文化安全内外挑战日益增多。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对我国展开文化渗透和入侵，试图以此削弱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民族凝聚力；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我国国内的文化安全威胁因素也不断增多。我国面临的文化安全形势变得日益复杂和严峻。

面对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应也无法再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孤立封闭状态，相反，我们应敞开胸怀，主动作为，积极吸纳、接受外来文化的先进和精华成分，剔除自身文化中的腐朽和落后成分。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扩张保持高度警惕，对自身的文化利益保持高度敏感。因此，将文化问题上升到政治和安全的层面来加以看待和理解，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制定文化安全政策，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时代课题。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安全问题。早在1983年，针对西方的文化霸权，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文化安全问题，“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①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2页。

“要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指出，“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2011年11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是以发展文化，维护文化安全为主题，专门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文化安全问题的持续关注和重视。

2. 研究意义

在此背景下，对世界各国文化安全政策展开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文化安全的研究框架。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安全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入、广泛的探讨，但研究范围主要限于文化安全的相关理论和对策问题研究。本课题以安全政策研究为视角，具体分析了一些代表性国家和政府在具体政策实践中是如何维护文化安全、拓展文化影响的。这有利于对原有的文化安全研究进行实证性验证和考察，有利于发现新的理论研究问题，也为文化安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

其次，有助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文化安全政策的制定。尽管目前我国已经越来越重视文化安全问题，并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客观地讲，我国仍缺乏一个明确的文化安全战略指导，文化安全政策体系也不够完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安全政策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进一步明确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的设计框架和路径选择，早日形成健全、完备的文化安全政策体系。

再次，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来自外部的文化冲击和威胁。通过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安全政策展开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些文化强势国家对我国开展的文化渗透和入侵战略，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更为充分地加以应对。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

现代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基本源自西方。1951年，加拿大政府颁布了《皇家科学、艺术、教育委员会报告》，明确提出：“我们的军事防卫能力必须确保国家安全，我们的文化防卫能力也要引起高度重视。文化安全与国防安全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分割。”^①这是西方最早使用“文化安全”这一概念的文件。但这份文件并未对“文化安全”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和阐释。事实上，西方学者并不经常使用“文化安全”这一概念，而是运用各种理论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文化霸权”论。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就开始从“文化霸权”角度对文化安全问题加以探讨。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它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形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极端霸权局面。^②可以说，葛兰西是第一个将文化问题纳入政治和安全领域加以研究的学者。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也趋于认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化殖民”的理论，从西方文化殖民的话语规则、逻辑程式的焦点来分析殖民主义者是怎样实现文化殖民的。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他还深入阐述了西方文化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提出在帝国的扩张过程中，文化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③

“文明冲突”论。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和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

① Report of Royal Commission o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rts, Letters, and Science, Canada, 1951, p. 275.

② 吴友军、郑冬晓：《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局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第28页。

③ 参见〔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

出：“冷战后，国家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主导人类最大纷争和冲突的因素将是文化上的差异。”“在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明而不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这种‘文明冲突’将决定‘未来的国际政治’。具有相似文明的国家组成新的联盟，而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将走向分离和对抗，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①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西方冷战思维的一种延续，是用文化差异替代意识形态差异从而寻找新对手的一种尝试。但“文明冲突”论在东西方学者中引起的广泛讨论也从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于文化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软实力”论。与亨廷顿强调文明冲突不同，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他认为，所谓“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力而非高压政治在国际事务中达到所要结果的能力。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者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实现自身所要结果的行为”。^② 软实力的行为模式是“吸引”，软实力的来源是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文化是构成软权力的重要资源，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吸引力使人心甘情愿地认同、服从，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文化产业的对外扩张，在向其他国家输出本国的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将本民族的价值观、宗教信仰、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传播出去，实现国家设定的战略目标。“软实力”概念提出后迅速得到广泛的使用，也为文化安全研究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理论视角。

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虽然没有提出“文化安全”的概念，但探讨的都是关于文化安全问题，也构成了中国学者分析文化安全问题的基本框架。但应看到，大部分西方学者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研究文化安全问题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这也导致其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2. 国内研究现状

“文化安全”这个概念，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开始在中国学界出现。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9页。

②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5.

通过对 CNKI 数据库的检索,直到 1998 年才有 1 篇文章的内容中出现了“文化安全”一词。到了 1999 年,上述数据库中则出现了 75 篇文内包含“文化安全”一词的文献,同时有 2 篇文章在标题中出现了“文化安全”,且都是专门探讨文化安全问题的学术文章。此后文化安全问题逐渐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中国学者对于文化安全的研究成果首先在于明确提出了“文化安全”这一概念。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目前仍是一个文化弱势国家,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减少或避免来自外部文化冲击的安全问题。其次,中国学者依托于国外学者提出的三种理论框架,并结合全球化和非传统安全的理论视角,对文化安全的起因、表现形式、影响范围和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再次,中国学者出于对本国利益的关切,更多地探讨了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威胁以及如何加以应对。

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全球化,所以很多中国学者是在全球化这一框架下探讨文化安全问题的,于炳贵、郝良华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一书中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角度,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化、文化认同与文化安全、文化安全的内因与外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方法论原则和战略措施。曹骏在《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中深入分析了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安全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挑战,提出了巩固中国国家安全的对策。沈洪波在《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全球化进程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及面临的问题。张骥在《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中论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文化安全观,从西方政治思潮、大众传媒、文化产业、文化外交、社会转型等多个角度,系统分析了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战略。除使用全球化理论外,中国学者也综合运用了“文化霸权”主义的相关视角,如李丽在《论当代中国文化安全》中讨论的主要观点是:“全球化使文化安全问题凸现,全球化从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化,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产物。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是更多地关注本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发展,警惕和反抗‘文

化霸权’。”

一些学者还主张在非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下探讨文化安全问题。潘一禾认为，非传统安全研究试图对各种“非军事安全”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让文化安全与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都获得更广泛也更专业的关注。“非传统”的安全研究也想以更开放的视野和更灵活的思路去讨论不同国家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更主动地促进各国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深度沟通、交流意愿和积极合作意识。^① 从非传统安全视野来研究文化安全问题的主要有王逸舟、朱峰等学者。

在对策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做出了大量论述。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且要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力，同时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来抵御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文化侵蚀，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韩源从四个维度来谈构建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基本框架，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要优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环境。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优化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环境是解决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根本性因素。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文化安全战略机制建设、文化产业建设和网络安全等具体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②

国内学者对于世界各国文化安全政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曹泽林在《国家文化安全论》一书的第八章“各国制定和实施文化安全战略的国际经验”中分析了美国、加拿大、韩国、法国和苏联的文化安全政策及经验启示；^③ 张建英在《文化安全战略研究》一书第三章“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战略概览”中分析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和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历史和文化安全战略。^④ 涂成林、史啸虎等在《国家软实力

① 潘一禾：《国家文化安全的“非传统”研究》，《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2期，第3页。

② 参见涂成林、史啸虎等《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研究——以广州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③ 曹泽林：《国家文化安全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④ 张建英：《文化安全战略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11。

与文化安全研究——以广州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一书中将世界各国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霸权文化群体、强势文化群体和弱势文化群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种文化群体采取的不同文化安全策略。也有部分学者以单个国家为案例进行了研究，如戴晓东的博士论文《加拿大：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复旦大学，2004）探讨了加拿大文化身份的历史演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面临的文化困境和应对。黄旭东在《美国文化安全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概括了美国的文化安全战略，指出美国文化安全战略的主体是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①类似的著述还有张法连的《美国文化安全战略探究》和余日昌的《论当代美国文化安全的战略特点》等。

从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文化安全研究还主要集中于理论和对策领域，现实政策研究还很缺乏，对国外文化安全政策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已有的研究在深度、广度上也较为欠缺。

三 概念的基本界定

中国学者对“文化安全”这一概念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论述，但目前并无统一的界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子杉认为，“文化安全就是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受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侵犯”。^②伍业兵认为，所谓文化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文化、精神生活方面不受外来文化的干扰、控制或同化，从而保持本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民族性以及本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安全”。^③焦艳丽、奚海燕认为，所谓国家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① 黄旭东：《美国文化安全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② 子杉：《国家的选择与安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第2版），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130页。

③ 伍业兵：《中国加入WTO后文化安全问题的思考》，《理论月刊》2003年第3期，第32页。

文化革新，消化和吸收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文化价值和文明生活方式”。^①胡惠林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存的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他认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②潘一禾认为，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虽然人们都清楚“国家文化安全”主要指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文化主权的安全，但其更明确的所指是：人们认为自己所属“国家－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会在全球化大势下出现断裂、退化或消亡的“安全感”，具体包括：（1）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上的安全感；（2）传统文化和独特价值体系上的安全感；（3）民族语言和信息传播上的安全感；（4）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素质上的安全感等。^③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文化安全的定义主要是从“文化”和“安全”这两个概念分别入手的，即“文化”的内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族特性等）加上“安全”的概念（一种不受威胁的状态）。但这种硬性拼接并未能反映出文化安全的本质，进而造成对文化安全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混乱。而且，这个定义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某种对文化的威胁在什么情况下仅是文化问题，而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文化安全问题？

事实上，文化问题，即一种公共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需要经历一个“安全化”的过程。巴里·布赞在《新安全论》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过程，即某个公共问题只要尚未成为公共争论与公共决定的问题以及国家并未涉及它，这一问题就还被置于“非政治化”的范围，所以还不是安全问题。当这个问题成为了国家政策对象的一部分，需要政府的决心和考虑资源的重新配置，或者还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公共治理体制的介入，则它就被置于“政治化”的范围，成为了“准安全”问题。而当这个问题被政府部门作为“存在性威胁”提出，并需要多方面采取紧急措施，甚至

① 焦艳丽、奚海燕：《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兰州学刊》2004年第6期，第13页。

② 参见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③ 潘一禾：《国家文化安全的“非传统”研究》，《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2期，第5页。

这些措施超出了政治程序的正常限度仍然被证明不失为正当,则这个问题就成为安全问题了。或者说安全化是公共问题进入政府决策的议题并且政府将运用机制与程序对之进行解决的过程。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所谓安全化就是使得一种公共问题经过特定的过程(如权威机构“宣布为危险”)而成为国家机构涉及的安全问题。^①

因此,文化安全问题实质上是一种政治问题,是国家和政府认定一种文化问题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而实施安全化之后形成的,其安全指涉对象和实施主体都是国家和政府。而能够对一国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的文化安全问题主要有两类: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和民族文化安全问题。

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文化基础,与国家政权直接相连,而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是国家文化主权的最主要体现,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靠国家政权来维护与传播,同时也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文化基础。国民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意识形态的缺失将导致政权丧失合法性而陷入危机。相比民族文化,意识形态较为脆弱,易受来自外部的影响和冲击,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和关键。

民族文化是国民凝聚力的深厚来源,是民族国家完整性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民族文化安全直接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民族国家核心利益。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形成的,相较于意识形态来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是民族文化一旦改变,将对一个民族和国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甚至会造成其陷入分裂或毁灭。所以说民族文化安全是文化安全的基础和根本。

除此之外,在界定文化安全概念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国家和政府维护文化安全不仅表现为一种防御型的姿态,有时也表现为对外扩展和进攻。世界各国根据实力的不同可以大体分为强势文化国家和弱势文化国家

① [英]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32~37页。